

■ 历史研究

论中产阶级对城市郊区化的推动作用

——以18世纪后期的伦敦为例

欧阳萍

(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18世纪后期,英国伦敦的中产阶级上层逐渐向城市边缘地区迁移,开始了城市郊区化的过程。其原因主要有:经济结构和家庭功能的变化;中产阶级对贵族阶级的模仿和对劳动下层人民的鄙视和排斥;福音派思想的影响下,中产阶级对各种城市问题的恐惧和逃避。

关键词:郊区化;中产阶级;核心家庭;福音派

中图分类号:K56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09)02-0103-04

德国著名学者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曾提出,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民族、国家、政治、宗教、各种艺术和科学都是以城市为基础的,“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1]200-206}的确,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城市发展的历史。而在这部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城市发展史中,社会阶级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尤其在近代,一个新兴阶层——中产阶级兴起,它携其独特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更是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促使城市从早期的“绝对集中”阶段过渡到“相对集中”阶段,也就是城市郊区化阶段。

关于近代早期西方的中产阶级这一问题,在史学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尤其是在英国,这个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最早开始城市化和城市郊区化的国家,中产阶级什么时候出现,包括哪些人,对城市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都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2]XV-XL}。笔者认为,如果从整个英国和欧洲的视野来考察,在16至18世纪期间,社会阶层结构中的确存在一部分处于贵族和下层社会之间地位的人,但这一部分人的组成太过于异质性,不能称为一个具有共同阶级意识、阶级利益的阶级。而且

“中产阶级”一词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开始使用,因此如果说在18世纪整个英国或欧洲已经存在一个非常明确的中产阶级是不确切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在历史研究中,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历史阶段和历史现象差异性:从英国或欧洲的整体情况出发,这时所谓“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股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力量;然而在伦敦这个特殊的城市——英国的首都,王室的长期居留地,英国海外贸易、国内贸易以及制造业的中心,以及贵族、乡绅、金融家和大商人聚集之地——中产阶级已经初步形成^{[3]3-16}。因此本文中所使用的“中产阶级”一词,主要指在这一时期英国伦敦地区,处于土地贵族阶级和劳动人民阶级之间地位的一部分人,包括大商人、银行家、专业人士等。

本文以18世纪后期的伦敦为例来分析中产阶级与城市郊区化之间的关系。从16世纪起,伦敦就是英国的首都,政府所在地,王室居留处以及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此,这个城市与其它各省的城市不同,很早就具备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特征:一方面人口向城市集中,并且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业性活动,另一方面是从乡村生活方式向

收稿日期:2008-12-17

作者简介:欧阳萍(1979-),女,湖南湘潭人,博士生,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城市生活方式转变,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伦敦的郊区化进程也相对较早,在18世纪后期就已经出现了郊区化的萌芽。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即试图对此作出论述。

一

18世纪是伦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这一发展,伦敦社会逐渐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可称为中产阶级的人,他们不像土地贵族那样不需要工作,依靠地租等收入过活,也不像劳动阶级要依靠繁重的体力劳动来艰难谋生。如果把18世纪后期伦敦中产阶级结构用金字塔形式来表示,那么位于最底端的,是大量普通店主、普通工匠以及艺术家等。处于金字塔结构中间的,主要是专业人士如医生和律师、中等商人以及一些政府机构成员。而中产阶级当中地位最显著、最重要的,则是从事伦敦海外贸易以及相关金融事务的人,即海外大商人和投资海外贸易的大银行家。众所周知,伦敦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海外贸易的中心。这部分商人精英一般拥有超过10 000英镑的年收入——几乎相当于一位贵族的收入。而在18世纪的伦敦,最早开始向郊区迁移的就是这一部分最富有、最重要的中产阶级上层。

在论述郊区化进程开始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郊区”含义的变化。18世纪中叶以前,伦敦市中心周围的地区并不像后来所认为的是逃离城市社会问题的天堂。相反,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城市中心地区才是惟一适宜和体面的场所,而在城墙之外的边缘地区是不名誉的地区,那里聚集着最贫穷、最低下的人以及某些最脏乱嘈杂的行业。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语言学方面的变化可以看出来。在《牛津英语大词典》的定义当中,从14世纪的最早使用到18世纪中期,“郊区”(suburbe)一词指的是一个“低等的、受人贬损的、尤其是放纵的生活习惯之地”^{[4]86}。在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许多妓院都被规定只能建在郊区这种不名誉的地方,而称呼一个人“郊区人”(suburbanite)则是一种严重的侮辱。

但是,到了18世纪中叶前后,这种观念逐渐有所变化。由于伦敦人口的急剧增长,环境污染和公共卫生问题日益严重,伦敦周围的地区逐渐显现出超过市中心的吸引力,有能力负担得起居住和交通费用的中产阶级上层,开始向伦敦郊区迁移。当然,这种迁移并不是突然就从城市到郊区,其中还经历了一种过渡形式,即所谓的周末别墅(weekend villas)。从17世纪开始,伦敦一些富有的中产阶级就开始在紧邻伦敦的乡村土地上购买或建造自

己的别墅,每个周末乘坐私人马车携家带着来到这里享受乡村的宁静和风景,然后在周一早上又返回伦敦市从事自己的各种经济活动。这种乡间住宅就被称为周末别墅。这些住宅也许并不那么富丽堂皇,但是毫无疑问,中产阶级上层尽力使自己与乡村贵族的住宅一样宽敞和舒适,使自己至少在每个周末能够过上像贵族的生活。当时一则广告对一所别墅的宣传,很好地描绘了这种生活方式:位于小山坡上的大住宅,拥有良好的视野,附带花园,能够从周围的农场上获得食物^{[5]499}。到18世纪中叶,拥有一所相当规模的周末别墅,成为描述伦敦最富有的商人所提到的特点之一。当时一位游历伦敦的法国作家写道:“在所有季节中,伦敦商人一般都在周六退居到乡村,直到周一才回到伦敦。”^{[6]109}

随着社会结构尤其是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福音派思想的影响,中产阶级上层开始重新思考周末别墅与其城市住宅之间的关系。他们逐渐将首要的居住处转移到乡间别墅,让妻子与孩子更多地留在乡间,以使他们远离伦敦城市的喧嚣、脏乱以及不道德。另一方面,商人们自己为了保持与全国乃至全世界市场信息的密切接触,为了开展自己的商业活动并且利用从中获得的财富,维持所谓的体面生活,而每天往返于伦敦与乡间住宅之间。这样,中产阶级上层逐渐开始了伦敦郊区化的过程。

18世纪后期,伦敦的中产阶级开始将家庭生活和工作生活区分开来,开始缓慢地向周边地区迁移和集中。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如工商业在这时的迅速发展,以及人口膨胀迫使疏散人口之外,在中产阶级本身而言,有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么做呢?或者说,中产阶级自身有什么动机开始伦敦郊区化的进程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第一,家庭生活方式及其功能的变化,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影响;第二,中产阶级对贵族阶级的模仿和对劳动下层人民的鄙视和排斥;第三,在福音派的思想影响下,中产阶级对各种城市问题的恐惧和逃避。

二

罗伯特·费什曼(Robert Fishman)曾经说:“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真正核心地位的,是中产阶级的家庭。”^{[7]4}这句话或许有其夸大之处,但是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方式确实是对经济政治活动、价值理念都有重要影响,并且对城市的郊区化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劳伦·斯通(Lawrence Stone)在其著作《1500-1800年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中提出,从17世纪后期开始中产阶级的家庭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到18世纪一种新的家庭,即所谓“封闭的核心家庭”(the closed domesticated nuclear family)已经完全形成^{[8]411-414}。从中世纪到十六七世纪,家庭的外部联系,即家庭与教区、邻居和亲属的关系,远比家庭的内部联系,即父亲、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要亲密得多。换言之,这种家庭是外向的、开放的。到了18世纪,由于商业资本主义要求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亲属集团的重要性逐渐削弱,而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则变得更为亲密。家庭内部的这种紧密关系,开始要求与外界环境保持一定距离,要求夫妻双方有更多感情交流和对孩子更加精心抚养。家庭从原来的经济单位而逐渐变成了一个情感单位。

然而,这种家庭关系的变化,却与传统的城市生活方式相冲突。从中世纪以来,大多数商人和工匠都是将家庭住所和工作场地合而为一。典型的作坊,都是前面是店铺,制造和出售货物,而后面或楼上则是家庭成员以及学徒、帮工共同居住的地方。即使是到了18世纪早期,即使是那些最富有的银行家,也多数是在自己家的客厅中处理事务、接待顾客,而大商人也都是在家里地下室存放货物。因此,几乎可以说,住宅的每一个地方都具有一定的“市场开放性”,每一个房间都有一部分经济功能和一部分家庭功能。工作和生活重叠,店铺和家庭住宅合并,这就是18世纪中期以前的城市家庭生活特点。在这种生活中,中产阶级无法阻止其他人对其私人生活的参与,无法杜绝其他活动对家庭情感的干扰,而必须将家庭和工作分离开来。

中产阶级家庭功能的转变,家庭和工作的分离为伦敦郊区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现在他们可以将家庭安置在离工作地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而伦敦城市中的拥挤、污染、道德败坏等问题,则更加促使中产阶级选择向郊区迁移。他们仍然在伦敦城市中心从事贸易、金融业务,仍然在市里的咖啡馆、酒馆交换信息,仍然从伦敦码头进出口各种商品;但是他们同时也开始将郊区住宅作为自己真正的家,让妻子在这里全心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成为维多利亚时期所谓“家庭天使”的最早形象。

除了家庭功能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之外,中产阶级对贵族的羡慕模仿和对劳动人民的厌恶排斥,也是中产阶级向郊区迁移的重要原因。有不少学者提出“18世纪英国消费革命”一说,认为在18世纪中产阶级乃至普通市民竞相模仿贵族上层的一些消费习惯,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消费价值取向。在18世纪伦敦郊区化的过程中,这种模仿贵族生活方式的现象的确存在。英国中产阶级拥有别墅,最早可以追溯至16世纪。当时,一些有名的大商人如托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与王室有着

紧密的联系,他们在保留位于伦敦市内住宅的同时,在伦敦之外的乡村也修建了奢华的庄园。而格雷欣在伦敦南部乡村所修建的奥斯特利庄园(Osterley)今天已经成为英国的历史名胜之一,可以明显看出是模仿了贵族奢华庄园的风格,这足以说明中产阶级上层在与王公贵族的接触中对贵族有着欣羨与模仿的心态。而此后其他中产阶级分子在购买和建筑乡间别墅时也是如此,将贵族生活中令人感到舒适和表现威望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

在模仿贵族生活的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将自己与劳动人民区分开来的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在18世纪中叶之前,虽然英国仍然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社会,但是富人和穷人常常居住在同一个社区,一些富有的银行家甚至是生活在穷人家庭的包围之中。然而这并无损于富人的社会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富人还借助周围穷人的对比来凸显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正如文学史学家伊恩·瓦特(Ian Watt)所说,18世纪的英国社会特点之一是“狭小的身体距离和巨大的社会距离之间的结合”^{[9]203}。然而,到18世纪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中产阶级上层人数越来越多,财富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希望以身体外在的距离感来确定社会等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伦敦游乐园中游客的变化。在18世纪中后期,伦敦的著名游乐园,如伏克斯豪尔(Vauxhall)和拉内拉赫(Ranelagh)游乐园当中游客大量减少,原因之一就在于所谓的“体面人”不再愿意像以前一样,与“下等人”混杂在一起。这种愿望反映在居住方式上,则是中产阶级希望居住在与穷人保持安全距离的住宅区,希望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价值观建立起自己专属的乌托邦——郊区。

最后,使中产阶级向郊区迁移的推动力,还包括:在福音派思想的影响下,中产阶级逃离城市问题的愿望。伦敦是英国最早发展起来的都市,是18世纪英国甚至整个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但是,在伦敦出现的社会问题也比较严重,人口拥挤、环境恶劣,公共设施落后。除此之外,在中产阶级道德家眼里,伦敦作为文化和娱乐的中心,所带来的犯罪问题、贫穷问题以及色情服务,都对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价值理念等产生了威胁。

面对种种城市问题,福音派信徒在中产阶级中上层宣传城市生活的腐败,提倡回到大自然、回到家庭,由此为郊区的发展提供了道德推动力。基督教福音派运动是主要兴起和存在于近现代英语国家和地区并影响全世界的一种神学运动,最早诞生于18世纪早期,主要是向下层百姓如矿工传教,到18世纪中后期,福音运动将宣传重点转移到强调新的理想家庭上来。

福音派对妇女在家庭中以及家庭以外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一系列道德标准:一方面,他们赋予妇女以道德教育中的最高地位,即基督教家庭中主要的监管者。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只有在母亲的悉心教导和严格管教之下,孩子们才会成为品德高尚的基督徒。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激烈地反对妇女参与在家庭这个领域之外的所有活动,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艺术。这种观点促使中产阶级上层更为坚定地将经济活动重心放在城市中心区,而将家庭生活的重心放在城区范围之外的住宅,每天往返于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根据福音派的主张,要获得拯救最可靠的途径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所产生的有利影响。因此,任何能够加强家庭当中情感联系的东西,都是神圣的;任何会削弱家庭道德的东西,则都是应该抛弃的。而在所有会对家庭道德造成威胁的敌人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城市。福音派提出所谓礼节改造(reformation of manners),实际上就是对所有城市问题的一次总攻击,反对剧院、舞会、音乐会、酒馆和游乐园。

福音派理想和现实的城市生活之间的矛盾,对于中产阶级迁移郊区提供了最后的推动力。在中产阶级看来,城市不仅是拥挤、脏乱和不卫生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要改变这种状态,使自己获得拯救,只有将家庭这个纯净神圣的世界,与充满诱惑的世俗都市隔离开来。但是这种隔离又不能完全排除男性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因为认真工作和获得成功也是基督教的一种美德;而且,贸易活动也要求商人与各种市场信息保持密切联系,要求商人能够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从事经济活动。这就是中产阶级面临的问题;而郊区,则是他们所选择的最终解决方法。

由此可见,郊区并不是某一个阶级或者某一些杰出精英的造物;它是历史发展演变的产物。因

此,早期郊区经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17世纪中叶之前,主要是穷人居住在郊区,还有一些带来污染和混乱的行业被限制在郊区。到了18世纪,随着伦敦中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壮大,他们开始有了自己对行动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要求,从服饰、饮食到居住风格和环境,都试图与其他阶级区分开来。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居住在郊区,而劳动人民因为负担不起昂贵的交通和房价,则开始向城市中心集中。在这样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中,城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郊区。

参考文献:

- [1]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M]. 齐世荣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2] Alan Kidd, David Nicholls.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Middle Class [M]. Phoenix Mill: 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 1998.
- [3] Peter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M]. London: Methuen, 1989.
- [4] Simpson J A, Weiner E S C.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econd edition, Volume XVII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 [5] Nicholas Rogers. Money, Land and Lineage: The Big Bourgeoisie of Hanoverian London [M]. Social History, 1979.
- [6] Pierre Jean Grosley. A Tour to London (vol. I) [M]. London, 1772.
- [7] Robert Fishman. Bourgeois Utopias: The Rise and Fall of Suburbia [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87.
- [8] 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 - 1800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79.
- [9]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57.

On the Roles Played by Middle Class in Sub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London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OUYANG P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British middle class in London began to move to the suburb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thus began the process of suburbanization. The reasons includ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economy and the function of family, the middle class imitating the aristocracy and despising the poor, the middle class evading the problems of cit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vangelists.

Key words: suburbanization; the Middle Class; Nuclear Family; the Evangelists

(责任编辑 杨凤斌)